

东盟研究丛书 曹云华/主编



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

——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



From Hostility to Amity:
ASEAN-Japan Relations since WWII

邓仕超/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东盟研究丛书/曹云华 主编

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

——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

From Hostility to Amity:

ASEAN - Japan Relations since WWII

邓仕超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
轨迹/邓仕超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2

(东盟研究丛书)

ISBN 978-7-5012-3245-1

I. 从... II. 邓... III. 日本—对外关系—东南亚国家
联盟 IV. D8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3075 号

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

——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

Cong Diduiguo Dao Quanmian Hezuo De Huoban

——Zhanhou Dongmeng—Riben Guanxi Fazhan De Guiji

责任编辑/杨志芬

封面设计/小 月

责任出版/刘 喆

责任校对/王 锋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 65265923

邮政编码/100010

网 址/www.wap1934.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京联新技术照排公司

印 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850 × 1168 毫米 1/32 8%印张 219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一版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暨南大学“211工程”资助出版

《东盟研究丛书》序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历史可追溯至 20 世纪 20 年代。暨南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华侨大学，创办于 1906 年。从 1927 年起，暨南大学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聚集人才，系统研究东南亚问题及华侨华人问题；曾出版《南洋研究》、《南洋情报》等刊物，并出版多种有关专著，还培养了一批东南亚研究人才，开创我国东南亚问题研究和华侨研究之先河。东南亚研究所不仅是暨南大学办得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科研单位，也是全国同类研究机构中历史较长、规模较大、较具影响的一个，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镇。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在东南亚经济、政治、地区国际关系和华侨华人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出版了几十种专著。20 世纪 60 年代创刊的《东南亚研究》（双月刊）已出版 160 期，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 ASSCI 来源期刊。该所在培养国际关系人才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已有 1 个博士点、3 个硕士点及 1 个本科专业，在读的各级各类学生 200 多人，已有近百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毕业。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一批中青年学者长期从事东盟问题研究，积累了许多资料，并且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早在 1995 年，曹云华教授就出版了专著

《东南亚的区域合作》，该书在国内外均有较大的影响，是我国东南亚学界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东盟的一本专著，曾经先后获得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和广东省高校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1998年）。为进一步开展对东盟的研究，我们最近出版一套《东盟研究丛书》。出版这套丛书的想法源自曹云华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课题组的几位同仁认为，有必要在该课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东盟的研究，并且把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在这方面的近期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这个想法得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赞赏与同意，于是，我们组织有关力量撰写和出版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我校的东南亚研究和弘扬学术精神，也是东南亚研究所参与我校“211工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非常高兴地看到我校的东南亚研究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推出更多、更高水平的成果；非常高兴地看到我校东南亚研究所有更多的青年学者走向成熟，用他们所学到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东盟进行多维的、多视角的和立体式的研究。衷心地祝愿我校东南亚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编者

2006年3月18日

前 言

1997年底，在第二届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举行了以东盟为主导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东盟+3会议（“9+3”，1999年后为“10+3”）。此后，在东盟领导人会议之后几乎每年一次的10+3会议成为东亚合作的最重要途径，10+3会议走向机制化，形成了“10+3”、三个“10+1”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体系。与领导人会议相对应，还有各种部长会议以及各个领域的高级官员和智囊会议。与此同时，各种学术论坛应运而生，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日趋完善的理论和舆论准备。可以说，10+3会议已经形成了官方与学界相互联系、梯次升级的立体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和东盟各国都认为10+3会议机制是目前东亚合作的最重要途径，在2005年第一届东亚峰会上和2007年第二届东亚峰会上，10+3会议机制更被确定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渠道。

温故而知新，今天备受重视的10+3会议机制之所以能够成功启动和健康发展，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国际背景来看，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加快，一些地区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加强了本地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与此相应，政治安全联系以及相关的地区机制也得到加强。1993年底欧共体向欧盟的升级，1994年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就是最鲜明的例证。10+3会议的正式启动，是冷战后全球地区主义加速发展和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过程来看，冷战结束前在东亚地区一直缺少一个类似欧共体那样强有力的合作机制，东盟也主要局限于东盟内部和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合作。冷战结束后，东盟将地区主义的目标指向东亚这一更大的范围，除了努力实现大东盟的愿望和加强东盟内部的合作外，为了自身和东亚的整体利益，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行动，推动东亚合作进程，建立自己主导的地区和国际对话机制，争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东盟除继续利用冷战时期已经存在的东盟外长会议和经济部长会议后的扩大会议等加强与各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协商外，还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倡议，并与有关国家一道创立了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欧会议等多边对话机制等。因此，以东盟为主导的10+3会议机制可以说是东盟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再次，从近因来看，东盟+3会议机制的正式启动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密切相关。1997年7月首先发生在泰国然后扩展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并进而影响到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仅被寄予厚望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合组织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对受援国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条件。与之相对，同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和日本虽然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都能够从地区利益出发，给危机严重的国家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国冒着巨大的风险，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虽然在危机初期反映迟钝，但后来采取了强有力的资金援助等措施，并努力促成东亚金融机制的建设。中国和日本的行为得到东盟国家的好评，而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再一次认识建立东亚自己合作组织的重要性。

最后，笔者特别想强调的是，东盟组织及东盟国家与东亚地区内其他国家长期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

系以及存在的各种合作机制是10+3会议机制能够启动并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无疑，中日两个大国与东盟组织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是冷战后东亚合作能够在某种程度开展起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说，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前后中国—东盟关系的迅速发展给东亚合作注入了巨大的能量，形成了目前中、日、东盟三角良性互动的局面，那么，以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战争赔偿为逻辑起点发展起来的东盟创始国与日本的关系，后来东盟组织及东盟各国与日本的各项交往，特别重要的是福田主义之后东盟与日本之间形成的各种交流机制及相互信任关系，为目前的东亚合作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甚至可以说直接促成了10+3会议机制的形成。冷战之前，在东盟首脑会议期间，日本有福田赳夫和竹下登两位首相参与了与东盟首脑的会谈；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访问东盟地区时，提议建立日本—东盟首脑会议机制，将原来不定期的日本—东盟首脑会议变为定期的首脑会议。毫无疑问，这些对10+3会议机制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今天以10+3会议机制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和东亚一体化建设局面的形成，既是冷战后东盟地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离不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全面发展，更与长期形成的东盟—日本关系密不可分。

二

本书作为《东盟研究丛书》中的一部，试图描述东盟—日本关系从最初的敌对国到在多个领域形成全面合作关系发展的大致历程，揭示东盟—日本关系的发展对今天东亚合作局面的影响，并尽可能地分析在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大框架下东盟—日本关系新的发展趋势。即使在今天，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与东盟各国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还很不平等，但东盟作为一个

地区组织，可以代表东盟各国与日本进行交往，也可以利用地区外大国来平衡日本的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东盟”作为一个翻译词汇，一些学者认为其不够确切，但它早已成为大陆学界的一个通用语，而这一通用语实际上可能包括东盟组织和东盟国家两种含义，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二者的结合。例如说东盟—日本关系，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实际上包含东盟组织与日本的关系和东盟各国与日本的关系两个方面，是在集合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如果从1967年8月8日东盟成立时算起，东盟—日本关系至今正好走过了40年的遥远历程。但是，如果要完整分析东盟—日本关系，还必须对战后包括东盟创始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与日本关系的建立，东盟成立前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各创始国与日本的关系进行追述。因此，本书将东盟—日本关系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即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重返东南亚阶段、东盟成立前后阶段、福田主义阶段和冷战后阶段。

（一）日本重返东南亚阶段

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各国与日本都是敌对国家。只有解除这种敌对关系，日本才能与东南亚各国发展关系。那么，由谁出面、用什么途径、需要什么条件来解除这种敌对关系呢？

国际关系是一个整体，国家间关系往往离不开国际关系大的背景。东盟成立前整个东南亚地区包括东盟各创始国与日本的关系又离不开冷战这一大的国际环境以及美国的作用。可以说，在东盟成立前，包括东盟创始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与日本的关系并非由东南亚各国和日本主宰，尤其对于日本来说，美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二战后，各国人民都期待过上和平的日子，但冷战气氛很快

就笼罩了全球，整个东亚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战的影响。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需要在东亚地区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和得力盟友。1947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高歌猛进，美国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刚刚战败的敌国日本身上，因此原先对日本的全面改造政策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扶持日本的政策。

冷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的扶持体现在多个方面。就美国与日本双边关系而言，美国“不计前嫌”，对日本实行了积极的资金援助，在日本对美出口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更向日本发出大量的军需订单，帮助日本发展经济；美国为了自己的东亚战略，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安全协定》以及《美日行政协定》等，还一再强烈要求日本重整军备。就多边关系而言，美国积极帮助日本从政治上、经济上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美国积极促成《对日媾和条约》的签订。

在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方面，美国更是大包大揽。一方面，美国“说服”日本当局放弃与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的交往，作为失去中国大陆市场的补偿，美国排除英国等东南亚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干扰，为日本确定重返东南亚的方针；另一方面，美国要求东南亚各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在遭到巨大的反弹后，又帮助日本制订最低限度的劳务和产品赔偿方式，使日本的战争赔偿变为日本进入东南亚市场的手段。

由此可见，战后东南亚与日本的关系最初是由美国策划和设计的，而这种关系以美国的冷战战略为出发点，离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相去甚远，与日本政府的某些想法虽然也存在一些距离，但美国的决策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日本国家利益的。

1954年底，缅甸与日本签订了战争赔偿协定，此后菲律宾、印尼和南越也相继与日本签订了战争赔偿协定。放弃对日索赔权的柬埔寨、老挝，遭受过日本侵略但没有索赔权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后来也得到了一些所谓“准赔偿”。尽管这些赔偿和准赔偿

与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损害相比微不足道，日本在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赔偿谈判和后来实施赔偿过程中，以强凌弱，大打折扣，但毕竟以赔偿为契机，东南亚各国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因为赔偿和准赔偿，日本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获得了和解，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日本凭借少量的赔偿，成功地实现了重返东南亚的目标。

（二）东盟成立前后阶段

这一时期从19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经过1967年东盟成立，1973年东盟—日本橡胶论坛的建立，直到1977年福田主义发表，总计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

1958年1月，印尼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和日本对印尼的赔偿协定。以此为标志，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基本上结束了与日本的敌对状态，与日本的双边关系逐步发展起来。对于东盟创始国来讲，它们刚刚从长期的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民生凋敝，百废俱兴，发展经济成为各国政府首当其冲的任务，因此发展与日本的经济关系也成为东盟创始国对日本关系的重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东盟各创始国先后制定了吸引外资的政策，日本投资以优惠的条件进入东盟各创始国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从日本方面来讲，1955年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日本开始对东南亚国家进行赔偿。在赔偿的带动下，日本的经济活动在东南亚特别是东盟创始国中迅速展开。在东盟成立前后约20年的时间里，日本与东盟创始国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日本企业对这些国家大规模的投资活动以及战争赔偿、政府开发援助和政府对企业海外投资与贸易提供金融支持的三位一体的所谓“经济合作”。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尽管东盟与日本的经济关系非常不平等，日本在东盟各创始国的经济活动甚至被批评为“经济侵略”，19世纪70年代中期，东盟各创始国还爆发了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但东盟各创始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迅速加强，奠定了战后东盟各创始国与日本经济关系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东盟与日本经济关系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一阶段，东盟各创始国与日本的政治外交关系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双边关系中各种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在各种外交事件的处理上，东盟各创始国大都与日本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而日本在积极发展与东盟各创始国经济关系的同时，对政治外交关系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例如，日本对与印尼关系的处理就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在处理双边关系的同时，日本还非常关注东盟地区内部事务，在19世纪60年代初，积极调停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因为领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些都为日本后来介入诸如柬埔寨问题和缅甸问题等东南亚地区事务的处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不可否认，在东盟成立以前，在东盟各创始国与日本的关系中，由于日本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美国的支持等因素，日本在多数场合处于主导地位。东盟成立以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主要变为与东盟国家的交往。尽管东盟成立之初，日本对该组织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东盟—日本关系从东盟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1973年东盟—日本橡胶论坛的创立，使这一质的变化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东盟—日本橡胶论坛的成立和四次东盟—日本橡胶论坛的召开，不仅表现为东盟作为一个自主组织与日本发生各种联系，而且从此开始东盟国家与日本关系在很多领域由过去的一对一变为多对一，使得东盟国家的组织性和主体性逐渐增强。这种变化改变了东盟各国与日本的力量对比，迫使日本重新考虑与东盟地区和东盟各国的关系，对后

来东盟—日本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 福田主义阶段

本书所说的福田主义阶段是指1977年福田主义发表直到冷战结束这一时期，虽然1989年4月又有所谓竹下主义的发表，但因为很快进入冷战后阶段，因此粗略地将这10多年时间的东盟—日本关系称之为福田主义阶段。

1977年8月，在东盟成立10周年之际，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届东盟首脑会议之后，东盟各国首脑与日本首相福田纠夫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东盟—日本首脑联合声明》。其后，福田访问了东盟各国，并在访问的最后一站马尼拉发表了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以比较通俗和具体的形式重申了《东盟—日本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的有关内容。由于这一演讲正式和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因而被称之为“福田主义”。

福田主义的发表虽然带有一定的个人因素，但形势比人强，福田主义的发表更与当时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化分不开，也是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从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化看，美国在越战失败后，在东南亚地区采取了收缩政策，而苏联则在印支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出现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希望日本填补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留下的权力真空，而日本也希望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需要与东南亚首先是东盟国家建立全面的合作关系。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自身逻辑来看，东盟组织的逐渐成熟和东盟国家自主性的提高，东盟—日本经济关系的加深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利己的经济渗透的强烈不满，都要求日本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战略调整。应该说，在东盟国家爆发反日运动之时，日本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反省，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东盟五国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改善日本与东盟的关系。不过，由于

各种原因，这一重任最后由福田来完成。

福田主义的发表是东盟—日本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可以说是东盟—日本关系的分水岭。从19世纪50年代末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进行赔偿到福田主义发表之前，东盟—日本关系以经济关系为主，而这种经济关系基本上是以日本为主导的。福田主义发表之后，东盟—日本关系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和机制建设等各个领域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东盟—日本关系由过去的日本主导变为相对平等合作的关系。

这一阶段东盟—日本经济关系有了长足的进步，日本长期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在日本贸易伙伴中也常处在第二、第三的位置。日本对东盟各国的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更是有目共睹。1980—1988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占对整个亚洲投资的一半以上。1985年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不仅保持了旺盛的对东盟投资的势头，而且将在日本国内丧失竞争力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1988年，除马来西亚外，东盟国家接受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占整个官方发展援助的60%以上，而印尼连年成为日本官方援助的第一大国。

不过，福田主义阶段东盟—日本关系更大的亮点在于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各种合作机制的建设。在这一阶段，东盟与日本国家领导人加强了互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从日本方面来看，除任期极短的宇野宗佑首相外，其他日本首相都访问过东盟地区。在访问东盟期间，日本领导人反复强调福田所讲的与东盟建立心心相印的关系，强调日本不做军事大国，要与东盟一道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在越南侵略柬埔寨造成的东南亚地区危机面前，日本与东盟保持一致，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从东盟方面来看，东盟各国领导人对日本领导人的善意都表示理解。1981年12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看东方”的政策，主张向日本学习。马哈蒂尔不断改善马来西亚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也

提升了整个东盟与日本的政治外交以及文化关系。

在合作机制建设方面，1977年8月第二届东盟首脑会议之后，举行了东盟—日本首脑会议，同时举行的还有东盟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首脑会议。时隔十年之后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三届东盟首脑会议期间，日本首相竹下登成为唯一被邀与会的外国政府首脑。至此东盟与日本的首脑对话机制虽未明文确定，但已初具雏形。

在福田主义阶段，除了首脑对话机制之外，其他各种合作机制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些机制主要有：1977年3月在东盟—日本橡胶论坛基础上成立的东盟—日本论坛，至1987年共举行了9次，至1998年共举行了16次；1978年6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建议，在东盟外长会议之后举行的东盟—日本外长会议，1979年升格为由东盟各国和日、美、加、澳外长组成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在每年的东盟外长会议后举行；在东盟的呼吁下成立的东盟—日本经济部长会议，1979年11月第一届东盟—日本经济部长会议在东京召开，第二届东盟—日本经济部长会议于1985年6月在东京召开。

包括首脑对话机制在内的各种合作机制都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尽管这些取得的成效不一定能令人十分满意，但它们的存在对东盟与日本保持经常性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东盟与日本的各种合作机制，是东盟与区域外国家建立的比较早的合作机制，它为后来东盟建立各种区域合作与对话机制提供了基础或借鉴，也为21世纪前后包括东盟+3领导人会议在内的东亚各种合作机制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四）冷战后阶段

1989年冷战结束至今已有18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世界两极格局的改变、世纪交替和“9·11”等重大事件。冷战结束

后，虽然地区热点问题不断出现，美国对世界的干预也没有间断，但世界总的局势趋于平缓。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与此同时，地区主义也在加速发展。1993年11月，1967年成立的欧共体宣布正式升格为欧盟。紧接着，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告正式成立。在东亚，中国和平崛起的速度加快，东盟地区主义加速发展，但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陷入长期停滞，日本国内政治趋于保守，90年代中期在政治上又重新确认日美安全保障体系。世界和东亚地区的这些变化都给东盟—日本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受日本经济低迷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福田主义时期相比，冷战后东盟—日本经济关系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贸易来看，东盟与日本的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有较大的起伏，进入新世纪后虽然比较稳定，但在2003年还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冷战后，东盟经常占据日本贸易伙伴的第三、第四位，而日本虽然在大部分年份仍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这一地位已经不那么稳固。从投资来看，冷战后，受经济不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对外投资大幅下降。与之相应，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尽管1994—1997年日本对东盟投资曾经有一个高峰期，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大幅减少，2003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还不及1989年的一半。尽管如此，冷战后绝大部分年份日本仍是东盟的最大投资者。

从经济援助来看，到20世纪末，日本对东盟的官方发展援助有一个较大的上升，进入21世纪则有所下降，而2003年日本又宣布为东盟提供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用于湄公河的开发和人才的培养。尽管1992年日本政府发布了《ODA大纲》，但日本对东盟的援助主要是为了争取东盟国家对自己的支持与合作，在所谓环保、人权、民主等方面，对东盟国家并没有特别严格的